

“新派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之驳论

——兼论刑法新派理论的地位

童德华, 张奕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武汉 430073)

摘要:新派理论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其理论脉络根植于漫长的古代刑法发展历史,直至今天的刑法理论与实践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新派已经在犯罪论领域退出历史舞台”的观点值得商榷,新派无论是从犯罪论抑或刑罚论的角度上讲,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旧派、新派理论先后诞生,并产生过两次典型的新旧派理论冲突,第二次学派之争平息后,综合主义刑法观形成。新派理论仍然活跃在当代舞台,具有一系列重要表象:在如今风险化社会、民主化社会、信息化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背景的需求呼唤下呈现出的理论表象;刑法介入早期化、抽象危险犯增多与象征性立法增多的立法表象;主观主义贯穿行为、过失、犯罪主体、犯罪结果、因果关系、实质违法性、责任本质、责任能力、共犯理论等理论领域的犯罪论表象。

关键词:新派; 旧派; 主观主义; 客观主义; 犯罪论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23)04-0010-13

一、问题缘起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就犯罪论而言,“新派已经退出历史舞台”^{[1]10}。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刑法学界曾经围绕新派或旧派理论发生过激烈争议,这种争议属刑法的立场之争,进一步说,属刑法实践与理论的基调之争。那么,新派是否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说,当今世界在犯罪论上的对立,是否真的仅为客观主义内部的分歧?如果说新派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就意味着以新派为根基的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现象都已经淡出当下刑法界之视野。但诸多现象表明,新派的主张在当下刑法理论与实践之中仍旧或隐或现。

新派与旧派之争,属刑法学的基本立场问题,而立场问题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立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2]。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属于意识范畴,由物质决定,并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一般唯物主义认识论相比,突出的理论先进性之一在于其持能动的反映论,承认意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具体而言,其一,立场直接决定个人的价值选择。一个人的立场与其价值选择紧密相连,不同的价值选择背后往往存在相应的立场

* 收稿日期:2022-09-21; 修订日期:2022-11-01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境外追逃领域外交承诺充分性研究”(202250701)

作者简介:童德华,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张奕然(通信作者),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站位,二者是一表一里的关系。比如在刑法学领域,对于自由与安全两大价值的衡量,站在客观主义立场决定必然倾向于“自由”价值,而站在主观主义立场则决定倾向于“安全”价值。其二,立场影响人对事实的发现和理解。意识具有主观性特征,不同的人对于同一客观对象产生的反映不同^{[3]82},并且意识活动本身就是一个主动的创造性过程。人的意识不仅是对事物外部形象的简单反映,还包括积极主动地加工制作、选择建构反映对象的成果。如在刑事案件中,虽然强调的是“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事实并非人脑对物质世界的全面复刻,而是经过办案人员选择接受、理解加工后不得不含有一定主观色彩的事实,办案人员的立场对这一客观事实部分主观化的过程产生强烈的作用与影响。其三,立场影响行为选择。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是意识能动性的另一大体现,“人在意识活动中形成目的、计划、方法等观念的东西,以这些观念的东西为指导,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将把‘观念地存在’着的模型、蓝图实现出来,为客观现实”^{[3]100}。因此,相关人员所持的刑法立场将会影响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决策与选择。综上所述,刑法立场的抉择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讨论该问题,以明确当下刑法面临的立场选择。

二、新、旧派刑法的源流

新派退出历史舞台的断言,其前提是存在新派。何谓新派,无疑是必先予以确定的。在刑法史上,新派是相对旧派而言,所以界定新派当从旧派开始。一般而言,刑法旧派又称为客观主义刑法理论,新派则称为主观主义刑法理论。在本文看来,它们的争论点在于是以维护自由权利为中心,还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中心。我们可以从近现代刑法旧派与新派的发展历史来把握其根本品质。

自由保障与社会秩序维护两大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刑法及其思想、理念发展的主要脉络,刑法理论沿着这一脉络不断进步。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曾发生过两次激烈的对立,其结果是否意味着客观主义彻底战胜主观主义?是否意味着自由彻底战胜秩序,而秩序价值被完全抛弃?这是本文期望回答的问题。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明晰新、旧派的相关概念及其发展源流。

(一) 刑法旧派理论的形成

中世纪的欧洲实行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教权与王权联合,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这一时期的刑法制度以“法与宗教道德的不可分性、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性、罪刑擅断主义、刑罚的残酷性”^{[4]46}为特色,全然服务于维护统治者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需求,呈现较典型的主观主义刑法特色。至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陈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对蓬勃的资产阶级力量的限制愈发明显,对于能够适应新经济基础的新制度、新思想的需求日渐强烈,在此政治经济背景下,启蒙时期的法学思想得以诞生。启蒙主义的法学思想是在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下,将根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发展至全盛的“自然法学”思想^{[5]67}。其自然法学的思想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以合理主义个人主义为根源,自然主义功利主义的色彩渐加浓厚”^{[5]68};第二,主张政教分离,强调国家权力与法律之于教权的独立地位;其三,天赋人权,刑罚权源自对于基本权利之侵害^{[5]71}。在刑法方面,启蒙主义思想已经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不处罚、罪刑法定、罪刑相称、目的论的刑罚观等观点,与中世纪的主观主义刑法观相对立,呈现鲜明的客观主义特色,形成历史上主、客观主义的第一次对立。有观点对启蒙主义刑法思想与(前期)旧派思想不作严格区分。如内藤谦教授认为,贝卡里亚、费尔巴哈既是启蒙主义刑法思想的典型代表,也属于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大谷实教授认为启蒙时期的刑法理论亦属古典学派^{[4]47}。不可否认,以客观主义为主要特色的旧派思想与启蒙时期的刑法思想一脉相承,启蒙主义刑法观为旧派的产生起到奠基作用,其中目的论的刑罚观更是为相对主义的旧派观念直接继承,但是对于二者不加区别的见解仍然值得商榷。其一,以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理论为代表的启蒙时期,刑法思想已经呈现旧派的理论雏形,但它是以零散的方式夹杂在众多其他领域的启蒙思想中一并提出;18世纪中叶,以贝卡里亚、费尔巴哈、黑格尔、边沁等人为代

表的旧派刑法思想则系统地塑造了旧派的刑法学体系。其二,理论上旧派有相对主义旧派与绝对主义旧派之分,其中相对主义旧派以启蒙主义刑法思想为直接基础,绝对主义旧派思想则与启蒙主义刑法观中的部分思想对立。因此,旧派刑法理论的内涵较启蒙主义刑法理论更为丰富和全面。

至18世纪中期,欧洲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拥有相当实力,政治上仍处于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统治之下,严重束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思想上启蒙主义思想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旧派刑法理论诞生。旧派立足于自由主义这一基本立场,有以下基本主张:主张自由意志论,认可理性与意志自由;基于意志自由,主张道义责任论;主张客观主义,关注犯罪行为;以报应刑论作为刑罚正当性根据^{[1]7}。以客观主义为主要特点的旧派思想的形成,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刑法观形成对立。对于此次主、客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冲突,虽然研究较少,但仍能从历史的细枝末节中窥见其存在。如旧派理论先驱之一贝卡里亚出版著作《论犯罪与刑罚》后,受到来自基督教势力的猛烈抨击和指控,“耶稣会教士安杰洛·法基内(Angelo Fachinei)受威尼斯共和国大议会的委托,撰写了名为《对题为〈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评论》的小册子,对该书及作者进行恶毒攻击,称贝卡里亚是‘宗教和基督教的敌人’‘恶劣的哲学家和坏人’”^{[6]52}。这体现了早期萌芽不久的客观主义思想与长期存在且根深蒂固的主观主义思想呈现敏感的对立状态。

(二) 刑法新派理论的形成

新派,又称实证学派或近代学派,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4]206}。这一时期的欧洲已经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提升,财富显著增长,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然而,在如此良好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一些危险的不安定因素逐渐滋生。其一,人口增加与生产方式变革加速欧洲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为适应工业化趋势,从乡村移居城市,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市公共卫生、住房和工作条件、就业等方面状况恶化^[7]。其二,城市化趋势明显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8]468}。“在许多中心城市,穷人生存的条件十分简陋和悲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4年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描绘居住在曼彻斯特的穷人令人震惊的悲惨状况”^{[8]468-469}。其三,工业化时代下手工业渐趋消失,新的生产方式中,工人们从事着重复性、缺乏创造性的工作,贡献感的弱化带来工人失落感的增强^{[8]472}。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阶级矛盾逐渐尖锐,社会紧张情绪蔓延,犯罪尤其是以盗窃罪为代表的财产犯罪数量急剧上升,累犯、常习犯显著增多,少年犯或青少年犯罪呈激增趋势^{[4]206}。对于这种犯罪激增的局势,旧派理论却显得无力。比如旧派理论重视犯罪行为而非犯罪人,无法对于人身危险性较高的累犯或常习犯进行特殊的、有针对性的规制措施,并且在客观主义报应刑罚观的指导下,忽视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机能,罪犯在监狱中没有得到较好矫治,因而形成犯罪一再犯罪的恶性循环。

新的社会问题呼唤新的刑法理论,加之科学研究不断进步,许多新型的科学部门如生物科学、精神病学涌现并蓬勃发展^{[6]168},为新派理论奠定了技术基础,新派理论由此诞生。新派理论内部可以先后划分为人类学派派系与社会学派派系。前者重视犯罪的生物学原因,以龙勃罗梭为代表;后者重视犯罪的社会学原因,以李斯特为代表。不论是人类学派还是社会学派,新派反对为个人自由牺牲社会秩序,持有以下基本主张:其一,反对意志自由,主张决定论;其二,以犯罪人而非犯罪行为为中心,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其三,主张社会责任论,认为刑罚是针对具有危险性人格的犯罪人的社会防卫手段;其四,主张目的刑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于目的正当性^{[1]8}。

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新派崛起,与以客观主义为特征的旧派学说形成对立,于20世纪初期产生历史上著名的主、客观主义第二次冲突。当时德国刑法处于修订中,刑法学界围绕Liszt《刑法的目的观念》一文的余波,形成非同寻常的火爆争执局面,并由学术争议逐渐上升至人身攻击,最后由政府出面制止。这场异常激烈的学派之争持续二十余年,直至争议的中心人物Liszt与Birkmeyer在1919年和1920年相继去世,加之纳粹政权谋求国家统一的刑法思想而剥夺了两个学派的基础,以及1924年超越

学派对立的诸多学者参与的国际刑法学会创立^{[9]19}。在此背景下,学派之争才渐趋熄火。

(三) 综合主义理论的形成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旧派争议逐渐平息后,现代刑法学理论呈现两种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趋势:以德日为代表的兼采新旧两派思想的综合主义刑法观,以意大利为代表的独立于新旧两派思想而诞生的第三学派——法律技术学派。相较之下,综合主义刑法观的出现是新旧两派相互吸收、融合的体现,并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在德国和日本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在如今刑法学理论中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综合主义刑法观有以下代表观点。其一,人格责任论。人格责任论就是在责任非难的对象方面,兼收体现旧派思想的行为责任论与体现新派思想的性格责任论而形成的理论。人格责任论认为责任非难的对象除犯罪行为外,还有其有责地形成的人格。所谓有责地形成的人格,是指不完全由人本身的素质以及所处环境决定,也受到行为人主体能动作用形成的人格,反之,对于独立于人主体作用的由本身素质、环境决定的人格部分,法不能予以非难^{[10]164}。可见,人格责任论没有绝对地采取意志自由或决定论的观点,也没有绝对地将非难对象放于犯罪行为或犯罪人上,而是一分为二地作出判断。其二,综合论的刑罚观。所谓综合论的刑罚观,是指区别于报应刑论或目的刑论,为刑罚设置单一、恒定的意义和目的而采取具体分析的思路,探求某阶段、某罪名等具体情况中刑罚的本质。有学者主张至少在实践阶段调和不同的刑罚观,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刑罚提出不同的需求,这些具体需求决定该案中刑罚的意义。比如激情杀人案里的刑罚目的不是为了恐吓第三者,而毒品犯罪中刑罚也并非像财产犯罪一样是为了赔偿损失^{[11]18}。这种观点从一个极具体的层面定位刑罚的意义,试图建立一种具有相当精确性的刑罚观。此外,还存在一种更具代表性的综合论刑罚观,从立法、司法、执行三个阶段分别定位刑罚的意义:立法阶段的刑罚主要发挥一般预防作用,但同时立法过程中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对犯罪人再社会化可能性的考量,分别从报应刑与特殊预防的角度对一般预防限度作出限制;司法阶段的量刑中具体确定刑罚时,主要考虑报应与特殊预防的需要;执行阶段的刑罚主要发挥预防再犯罪的特殊预防功能,但同时作为一种对犯罪后果的宣示,也具备一定的一般预防的作用^[12]。这种观点通常称为“合并主义”刑罚观,相比前一种观点,它从一个相对抽象的层面归纳不同情形下的刑罚意义,并且使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从刑事立法、司法、执法全过程中得以糅合,具有更为显赫的理论价值。其三,目的行为论。目的行为论认为:“行为的本质就是,行为人设定一定目的,选择实现该目的的必要手段,并操纵、支配实现该目的的因果关系。”^{[9]75}目的行为论与客观主义倾向的因果行为论相比,将意识的内容纳入行为概念;与主观主义倾向的人格责任论相比,对行为内涵中的客观方面作出更具象的考虑。因此,它能够做到将行为人主观目的与在此支配下引发的客观因果进程相关联,一体考察行为的本质,是一种综合的行为理论。

对于综合主义刑法观,应当客观全面评价。一方面,综合主义理论的优势在于,不再坚持统一和恒定的价值立场,而是更多地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分为二式思维,“不再一味地追求刑法的理想,同时拒绝刑法学的世俗化,使刑法学的研究有一定的超然性,因而更具前瞻性和发展动力”^{[13]38}。另一方面,融合两种立场的综合主义理论自身是否具有自洽的理论基础,如果具体分析的结果本身并不能逻辑地被推演得出,而只是机械地拿取不同理论中的结论,那么就会使其变成一种“简单相加式的综合理论”^[14],在两种不同的价值间随意跳跃,从而破坏刑法学理论体系的统一性。总而言之,在肯定综合主义理论价值的同时,应当认可刑法理论中仍然存在的新旧派思想争议,如何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上搭建能够吸收不同理论之成就、克服不同理论之弱点的综合主义学派,为当代刑法学留下探索的空间。

三、新派理论的现代表象

如上所述,新派理论源远流长,并且,当今新派思想在社会层面和法教义学特别是犯罪论的层面,

都存在重要表象,体现出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新派或主观主义思想仍具有独特的理论魅力与价值。

(一) 现代社会呼唤下的新派理论表象

现代社会呈现风险化、民主化、信息化、后现代化四大典型特征。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当今刑事法规范、理论提出不同以往的新需求,在这些需求的呼唤下,新派理论的当代生命力具备了现实根源。

1. 风险化社会:一般积极预防刑罚观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传统工业社会的危险存在根本区别。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将其特征概括为风险的人为性、风险的难以计算性、风险的全球性及不可避免性^[15]。风险社会预示着确定性的流产,也暴露出人类理性的极大局限^[16]。人们曾认为社会的运行可以通过一种精确的方式来测量与计算,但在风险社会中将不再成为可能。风险的极大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新的忧虑和恐慌,也对当代刑法提出新的要求。与以往相比,新时代应特别强调构建安全刑法和发挥犯罪预防机能。在此背景下,积极的一般预防刑罚观的理论价值逐渐凸显。所谓积极的一般预防刑罚观,是指刑罚的制裁通过对违法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传递“坚持遵守规范是正确的”信息,从而对没有违反规范的一般民众产生激励、表彰和肯定效果,引导公众认同规范、尊重规范,进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17]。积极的一般预防相比特殊预防更注重事前规制而非事后评价,相比消极的一般预防,更强调刑法对法益侵害风险控制的提前介入,因此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不可避免和损害后果无法估量的风险特征。

2. 民主化社会:规范认同与规范遵守

过去,刑法通常倾向于作为一种裁判性规则,即法官对某行为作出判决,相关人员无条件接受执行的结果。这种将刑法简单地作为暴力工具使用的观念,实际上忽视了刑法对其他民众的影响,忽视了法律的受众对于规范是否认同的重要问题。

在当今民主化社会中,行为人不仅是法律上规范的接收者,也是规范的缔造者,自治而有人格的个人对其利益(可能的)应当得到怎样的协调和处理有着相应的理解,这种理解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为各种规范^[18],民众便基于此规范,彼此进行友好的理性交往。因此,在民主政治背景下,对于规则遵守的动力,源自对规则的理解和认同,要发挥刑法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单纯以暴力方式保证实行不再是一个有效方式,而应当增强民众对法律规范的认同,并基于这种认同感,使其主动选择遵守而不是违背规范的行为,即强调刑法作为行为规范而不是单纯作为裁判规范的作用发挥。那么,民主化社会中以规范认同促进规范遵守的逻辑,便要求刑法关注人对规范内容的认同、人对规范实行的感受和遵守规范的动力,而不能仅关注客观发生的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

3. 信息化社会:重预防与上游控制

信息化社会中,技术突飞猛进,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犯罪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呈现新的态势与结构。其一,犯罪空间虚拟性。犯罪空间从现实空间转移至虚拟的信息空间,使得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把握更抽象。其二,危害结果难以控制。犯罪信息一经网络,便易在网络空间无限蔓延,造成危害结果无限扩大。其三,实害结果难以计量。信息犯罪侵害的法益区别于传统犯罪中能够直接以金钱衡量的法益,呈现抽象化的特征,加之信息在虚拟空间无限传播、难以控制,最终造成的结果往往难以精确计算。

信息化社会中犯罪呈现的上述特点,使得传统的客观主义刑法观在某些领域的调控中陷入失灵的困境。如,客观主义重自由轻秩序,然而在信息领域的自由做出的每一小步让步,可能造成社会秩序不合比例的重大损伤。再如,客观主义刑罚观重报应轻预防,而事实是刑法单纯在事后作为报应手段的介入,一是很难对犯罪人及其行为造成的结果给予精确相称的刑罚,二是对已造成的法益损害结果往往难以作出有效弥补。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强调刑法的“上游控制”,即在法益侵害尚未实际产生、只是具有侵害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惩罚^[19],这便是对信息化社会中刑法预防犯罪功能的强调。

4. 后现代社会:社会共识与商谈

后现代主义反思与解构前现代主义,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去中心化与反对权威。前现代主义强调权威的作用,内容的正确性源自主体的权威性,具有知识的精英群体可以支配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存在所谓权威来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事实的认知、价值的判断来源于主体在商谈之中形成的共识,这与前述民主化社会的要求存在相通之处。

在法律领域中,后现代主义要求尊重普通民众对正义的理解和对于正义与否的感受。民众或许无法准确判断一份判决的正误,但是可以表达对这份判决的感受。美国学者保罗·罗宾逊肯定人所具有的所谓正义的直觉,即普通大众对于司法并不都是非常模糊的评价,对于犯罪与刑罚的评价也并不必须是一个纯粹理性分析的过程,可以包括人们作出的直觉性判断^[20]。可以认为,在一个良性的法律制度构建中,不能忽略民众对于法律感受的表达,否则,将会造成所谓法律精英群体与普通大众群体对立,也会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

因此,对后现代社会中刑法的塑造,强调关怀人的需求与感受,重视规范获得反馈与认同,反对权威对正义的直接界定,以社会商谈过程中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进行立法和司法决策。

(二)现代刑事立法中的新派理论表象

新派理论在立法上呈现三个重要表象,即刑法介入早期化、抽象危险犯增多和象征性立法增多。

“刑法介入早期化就是将刑法处罚的阶段提前”^[21]²⁰,在危险尚未发生或比较抽象的时候介入刑法对法律关系的调整,体现风险社会中应对不可预知、不可计算风险的公共政策的要求,也是主观主义重视预防思想的表象。比如,抽象危险犯增多。抽象危险犯不需要待实害结果出现才处罚,而是当行为体现出法律规定的抽象、典型的危险性时,可以施以刑罚处罚,体现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德、日等国的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渐成扩张之势:其一,满足控制风险、提前保护法益的需求;其二,符合积极的一般预防的刑罚理论,有助于发挥刑法规范的行为指引功能;其三,可以减轻证明的负担^[22]。我国立法中也有所体现,如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将具备典型危险的驾驶行为入罪处理,将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在抽象危险阶段予以预防。再如,预备行为犯罪化现象。由于预备行为不满足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对预备行为以不处罚为原则。但在风险社会,由于风险的延展性与不可预计性,当某些风险一旦真正转化为现实危害结果,对法益造成的损害可能无法估量也无从弥补,鉴于行为人在实施这些重大犯罪的预备行为时造成的抽象性危险,出于对社会共同体安全的考虑,将预备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21]²¹。

德国学者 Winfried Hasseme 将象征性刑法概括为:“为了应对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立法者过度高估刑事立法于实证经验上的成效,且实际上根本不期待刑法任务可以实现,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扩张刑事立法。因立法者原本就无意对立法是否具有成效的问题提出任何解释,故可能衍生的立法不足也就没有调整改进的必要。最终立法者获得政策上的象征性利益,例如回应社会问题的敏捷性、行动能力以及企图让刑法适用范围更具全面性等。”^[23]象征性立法情况一直受到争议,并以批评性观点居多。批评的观点多以传统客观主义观念为立场,认为“象征性立法过多地服务于安全目的而损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因谦抑不足而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24]。有观点对此作出反驳,认为在后传统社会中充斥着各种人为的技术性风险,而且伴随着“传统”的终结和信任缺失的情形,古典主义强调的刑法谦抑性已不再具备与传统社会全然相同的基础,如今刑法治理犯罪的理念和方法也应与以往有所不同,强调刑法的象征性并不必然违反谦抑原则^[25]。

本文认为,纯粹批判象征性立法的观点欠缺考察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任务、机能。诚如德国刑法学家托马斯·魏根特所言,“在风险社会中,刑法已经改变它自身的形象:它不再像严厉的父亲,除了仅就个别严重悖逆它的行为给予粗暴的惩罚外,放手让人们去自行安排生活,而更似一位悉心的母亲,一位不断规劝的陪伴者”^[26]。从某种意义上看,象征性立法发挥警醒作用,提示人们何种行为不可为,体现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一般预防作用。

(三) 现代犯罪论体系中的新派理论表象

1. 行为:社会化评价

行为理论中的社会行为论体现新派的立场。社会行为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由德国学者修密特提出的行为理论。此后得到恩吉、迈霍弗、耶赛克、佐伯千初、吉田敏雄、西原春夫等学者的赞同,是一种有影响力的学说^{[27]120}。修密特认为:“所谓行为,是指向社会性外界的有意的态度,严格地说,是有意的态度引起的外界变更。”^[28]德国学者耶赛克也界定社会行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人的态度”^{[29]307}。社会行为论重视行为的社会价值,认为只有本身具有意义、并且对社会也具有意义的人的举动,才是法律认为的行为^{[13]82}。因此,在对行为的评价上,该理论的特点是不再局限于在客观事实层面界定行为,而是在评价中融入社会价值层面的考量。根据社会对刑法规制范围的需求,只有具有社会意义,或者更具体来说,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社会希望保护之法益有意义的举动,才被认定为行为。这与新派理论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点相吻合,体现了新派立场。

2. 新过失论:结果避免义务

旧过失论基于结果无价值论,对于发生的法益侵害结果,只要能够认定其与行为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行为即具有违法性,以“法益侵害的预见可能性”为核心的过失仅在责任阶段发挥作用,这便导致“给予了只是引起法益侵害结果就评价该行为违法的不妥当判断”^{[30]95}。新过失论基于此局限,将过失判断的核心从结果预见可能性转移至结果回避义务的履行,使过失从违法性阶段开始发挥作用,认为在“行为者根据法律尽力做出了客观所命令的义务”^{[30]95}的情况下,可以排除行为的违法性。

新过失论以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础,认为若行为人进行了符合规范要求的避免结果发生的行为,则其侵害法益之志向性被否认,因而不具备行为无价值的违法性,不成立过失犯。新过失论关注行为人对法规范的态度,有效地将体现对法规范认同感的行为排除于违法范围,体现新派思想的要求。

3. 犯罪主体:法人犯罪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理论上经历了一个从全面否定到肯定占上风的过程。通过梳理理论发展史,可以认为在肯定法人犯罪主体地位的证成中,存在两大主要依据:一是存在论依据,即以论证法人存在与自然人相仿的意志自由,进而肯定其事实上的犯罪行为能力;二是价值论依据,即以法律的保护目的为出发点,通过肯定自然人与法人的法律人格共通的价值基础,从而将法人纳入犯罪主体。如果存在论依据体现的是传统旧派理论对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思想进行的自我革新,那么在价值论依据的构筑上,新派理论则作出更为突出的贡献。

在传统旧派理论报应主义、客观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常会得出否认法人犯罪主体地位的结论^{[31]14}。旧派刑法学以报应论为基础,强调刑事责任是以意志自由为前提,并基于此对主体进行谴责而生成的伦理非难^[32],这种责任非难“只对于具有为伦理的自我决定的主体性的人格者才有可能,法人是社会的存在体,不具有伦理的主体性,因此不具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33]。

为破解上述传统旧派理论造成的论证困境,新、旧两派思想都作出了努力。其中,新派的部分思想为法人犯罪主体的肯定提供有力支持。其一,目的刑论。新派主张刑罚因能够符合教育、改造和预防犯罪的目的而正当,法人活动日益活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愈加凸显,出于维持社会秩序、保护法益的需要,法人成为犯罪主体势在必行。如英国法学家威康斯指出:“法人的刑事责任,是把功利主义理论应用于刑法的一个典型,它不是以公共的理论为基础,而是基于遏制犯罪的需要。”^{[31]15}这与新派目的刑论思想根基一致。其二,社会责任论。企业能否作为犯罪主体,与企业是否能够承担社会责任是一致的。由于在论证企业自由意志方面存在困难,道义责任论在此发挥的作用有限,而新派的社会责任论则从另一角度提供依据。社会责任论将主体行为彰显的社会危险性作为承担责任的基础,刑罚是防卫社会的手段。因此,判断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不应以刑罚的伦理责任为标准,而应以是否顺应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保护的为目的为标准^[34]。甚至有论者认为:“企业的犯罪主体资格被认可,完

全系社会责任论的推动。”^[35]此观点过于激进而失之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责任论对于法人犯罪主体地位确立的重要意义。其三,受刑能力说。在判断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上,必须认识到刑事责任能力作为刑事主体资格的一项法律制度具有的价值性与目的性,即“主体的成立不是因为某人具备某种事实上的能力,而是因为其成为主体符合刑事责任主体制度所要实现的价值目的”^[36]。新派则将责任能力本质视为受刑能力,即如果通过对于行为人刑罚的科处,能够实现刑罚设置之目的,则具备责任能力^{[37]77}。这便为法人犯罪主体资格在刑事责任方面的论证扫清障碍:通过对法人施加各种刑罚制裁,可以实现打击再犯罪能力、抑制法人将来犯罪动机的效果,刑罚能够产生应有的效用,因而法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4. 犯罪结果:危险结果

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结果指实害结果,现代刑法理论中犯罪结果还包括危险结果,即造成法益受到侵害的危险。基于此,便产生“以发生法益侵害的危险为足够的犯罪类型”^{[27]155}——危险犯。其中,当某个违反规范的行为对受保护的客体造成的可能危险在案件中具体出现时,为具体危险犯;当某行为对受保护客体造成的危险仅建立在法规范认定的层面时,为抽象危险犯^[38]。危险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规定,有利于刑法对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与前置化,是新派目的刑论思想的体现。

5. 因果关系论:规范化

最初的因果关系理论停留于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层面。如条件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条件关系,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因果关系作出纯粹客观意义上的认定,具有确定性的优势,但是无疑扩大了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因此,后来的学说都从不同角度对事实因果关系进行限定,从而得到规范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如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立足于社会经验法则的考虑,具有相当性的论理的因果关系”^{[13]100};客观归属理论通过法律不允许危险的制造、提高与实现理论,限定结果可归属的范围。

因果关系理论规范化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体现了新派防卫社会的价值基点。虽然由事实因果关系限定为法律因果关系的途径不同,但共同点是都融入价值的、规范的判断,而价值、规范判断标准的确定不能脱离对于社会秩序需求的理解,即出于对法益保护的需求,适合将哪些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确定为规范层面的因果关系,进而确定将何种行为纳入可能的刑罚处罚范围。

6. 实质违法性:人格不法理论

人格刑法学作为改良的行为人刑法的重要分支,在当代刑法理论中仍然活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最初,新派理论关注的犯罪人人格被吸收进责任阶段的考量,产生由毕克迈耶首创的人格责任论;其后,人格责任论在日本得到团藤重光、大塚仁等学者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格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作用,提出系统的人格刑法学理论。其中,大塚仁的人格刑法学将人格理论从责任论拓展到整个刑法学理论体系,使人格要素在不法阶层特别是在对实质违法性的判断上发挥作用。我国对于犯罪人人格融入实质违法性判断上亦存在有力观点。较为激进的观点如张文教授主张建立行为判断要素与人格判断要素各自作为独立定罪要件的犯罪人成立二元定罪机制,重构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并主张设立法定的犯罪危险性人格类型,作为定罪的关键和核心条件^[39]。相对较为缓和的观点,如刘艳红教授以“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是一种或然的联系”为基础,建立二层性定罪标准,充分发挥犯罪人格选择性的定罪因素作用,发挥犯罪人格的出罪功能^[40]。

将“人”的因素纳入不法判断的人格不法论,作为新派行为人刑法理论的重要分支理论,有利于弥补行为刑法在不法判断依据上过分依赖行为及造成的结果、在判断标准上过分强调抽象的一般理性人能力、在判断结果上弱化矫正罪犯回归社会机能的局限,推进对不法的判断从“一般化”向“个别化”转型。此外,该理论对于当前备受关注的刑事合规制度的构建具有一定启示。当前我国刑事合规的司法效果主要体现在检察阶段,由检察机关通过合规不起诉来实现,导致提前阻却对涉案企业罪与罚的评

价,使得合规效用不能进一步深化。而人格不法论刚好为刑事合规在刑事不法即定罪的评价上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企业建立合规的程度来判断其是否具有犯罪人格或程度,进而评价其是否不法或不法的程度,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路径。

虽然目前人格不法理论尚停留在理论诠释阶段,但该理论的潜在价值与未来发展已得到认可,正如有论者指出“‘以人为对象的’人格刑法学将是未来刑法的发展方向”^[41],重视犯罪人人格特征,在犯罪论中纳入对其人身危险性及其他人格因素的衡量,“不惟是为了使行为中心刑法学理论增添视角、扩展视野,更是为现代、后现代社会中刑法学发展设立重要的理论增长点”^[42]。

7. 责任本质:规范责任论

规范责任论是对心理责任论批判而形成的理论。对过往理论的核心改进之处在于,承认在心理性事实之外,责任的评价需要引入规范的评价因素,即可谴责性或者说可非难性^{[43]18}。而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是规范评价标准中的核心要素^[44],成为规范责任论的中心概念^{[45]224}。主客观主义争相论证规范责任论为自己的理论。有观点认为,规范责任论的核心部分——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发生史上是从古典学派即客观主义立场提出的主张^{[45]292},这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认为,新派主观主义刑法思想对于规范责任论的核心部分作出重要贡献,该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新派仍活跃于犯罪论的重要体现。

从理论根基看,与既往道义责任论相比,规范责任论的新生理理论内核——期待可能性,是以承认决定论为前提。规范责任论肯定在一般场合下行为人的意志自由,但是认可并强调欠缺期待可能性的特殊场合中的行为决定,即行为人虽然行为违反了法规范,但其“行为决意乃至行为受到外部情状决定”^{[46]138},因缺乏期待可能性对此不能非难而排除责任。反驳意见可能认为,新派所主张“决定论”之决定与欠缺期待可能性语境下的“行为决定”不可视为一物。有论者指出:前者强调行为人的人格特征对于犯罪行为的决定意义,即“犯罪人先天的遗传基因或者后天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不良个性决定了犯罪行为的必然性”,后者则强调行为时外部情状的特别异常决定了即便是普通人格作用下违反法规范之决意的作出^{[46]138}。显然,这种观点狭隘地理解了决定论的内涵。能够引发期待可能性讨论的情状,的确更强调非常规的外部异常导致的决定作用^[47],但同样彰显新派决定论思想。新派鼻祖龙勃罗梭主张犯罪人定型说,强调的是由于犯罪人先天、自身的生理因素所导致的犯罪必然发生,但新派所主张的决定因素并不只局限于此,而是主张事物受因果法则的支配,行为依身体要素与所处环境要素竞合作用下而决定^{[4]208}。因此,在欠缺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中,不论是犯罪人个人还是外在异常环境作用主导下的行为决定性,都属因果法则的决定性,都涵盖在新派决定论的理论范畴中。需要注意的是,规范责任论并非否定意志自由,也并非主张决定论绝对化,只是用来优化既往责任论的新生内核理论——期待可能性。建立在承认行为决定基础之上,这体现的是新派自我理论更新形成的一种较柔和的决定论思想,故不乏观点支持“规范责任论是社会责任论自觉演绎”^{[13]193}的结果。

规范责任论体现了新派目的刑论思想意蕴。主观主义提倡目的刑的刑罚本质观,刑法应从社会防卫的目的出发,防止行为人再次犯罪以及防止其他人犯罪。而规范责任论实质上属规范论的范畴,规范论的理论特色在于作为判断的标准包含评价的要素,并且该标准是从特定的目的引申出来的^{[43]18}。在适用不具备期待可能性而免责的情况中,实际上可归因于对刑罚目的可达成性的考虑^{[11]238}。如前文所述,由于适用期待可能性免责情状的重大异常性,条件难以复制,使得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必要性欠缺,因而不对其科以刑事责任。

规范责任论与新派主张的行为人刑法理论所共通。规范责任论不仅关注行为人外部对法规范的遵守与否,更关注行为人内心对法规范的态度。Welzel认为:“责任判断的对象虽然是行为,但我们目光所投向的是产生行为决意渊源的法律上的错误的心理(值得非难的法心理)。”^{[29]567} Goldschmidt提出的二元规范论认为,依据行为人对于法规的外部态度认定违法,依据行为人决定采取上述外部态度的内心态度决定责任,行为人采取适法行为,或者虽然采取违法行为,但是没有进行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

性时,都表示行为人内部对法规范的服从态度,都不能进行归责^{[10]165}。与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的心理责任论相比,规范责任论的考量从纯粹事实联系走向规范评价,而规范评价则包含对行为人违反法律志向性的重点考量。欠缺期待可能性情况中,行为人对法规范并无忤逆之态度,因而人身危险性低,被排除在刑事责任之外。由是,规范责任论体现新派关注行为人自身的理论色彩。

8. 责任能力:受刑能力——刑事合规

针对责任能力的实质这一问题,新派与旧派之间存在“受刑能力说”与“有责行为能力说”的对立。旧派将责任能力的本质视为有责行为能力、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10]170}。有观点认为,责任能力是指“认识行为的违法性并且能够根据该认识控制动机的能力”^{[30]194}。新派则将责任能力本质视为受刑能力,如社会责任理论将责任能力理解为刑罚适应能力,即通过对行为人刑罚的科处,能够实现刑罚设置的目的^{[37]77}。

在当今理论中,旧派主张的有责行为能力说支持人数众多,然而这并不能使人忽视新派受刑能力说自身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对解决当代问题的独特的时代价值。具体而言,受刑能力说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备合理性和优势。其一,现代汉语中,责任是指“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48],那么刑法语境下的不利后果即指刑罚。也就是说,单从文义上理解责任能力,指的是负担刑罚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申理解为“有责的行为能力”或是“犯罪能力”。其二,受刑能力说能够更有效地发挥界限机能:只有具备刑罚适应能力,能够通过接受刑罚得到教育、矫治而与社会规范相适应的人,才值得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受刑能力说直接通过刑罚适应性这一标准,将不属于刑法调整范围内的主体划出,发挥了界限机能;相反,有责的行为能力说在此方面则有局限,因为在其界定之下,实质上具备认识违法性并根据认识控制行为的能力,形式上却不满足刑法规定的具备受刑能力要素的主体,如心智成熟、身体强壮却不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并不像法律规定的那般被当然排除于刑法调整范围,造成理论上刑法调整范围的模糊。其三,受刑能力说能够为保安处分提供理论依据:针对当今犯罪低龄化问题凸显的现状,出于防卫社会的需要,对事实上实施了符合犯罪构成之行为却不达刑事责任年龄的青少年,采取保安处分予以教育、矫治具有必要性;然而,客观主义的责任能力说并不能为保安处分提供理想的理论依据,根据道义责任论观点,不具有辨别是非并据此实施行为的能力则不具备意思的自由^{[45]229},那么便失去道义上予以非难的基础,让行为人承担保安处分非难之根据很难自圆其说;受刑能力说应对保安处分的加入不会造成前后理论的体系性矛盾,因为责任能力“仅仅是指能适应刑罚的能力而已”^{[45]230},具有有责行为能力却不能适应刑罚的人,并不当然丧失适应保安处分的能力,从而为保安处分奠定了自洽的理论空间。反对受刑能力说的一个主要意见认为,此说会造成行为与责任能力不同时存在,从而违背责任主义原则。其实不然,行为时行为人的责任能力仍然存在于一个抽象的层面,并且随着行为充足犯罪构成得以具体化为现实的受刑能力,不会导致行为时责任能力缺失。

如前文所述,主观主义对责任能力持受刑能力说,认为只有对理性的主体施加刑罚,才能实现教育、预防的目的,以此为根据确定责任能力标准。如今,顺承新派受刑能力说,责任能力又被赋予新的内涵:除了传统的精神障碍、不达刑事责任年龄等消极因素否认主体刑罚适应性外,还可以通过肯定行为主体满足某些积极因素,消除对其施加刑罚的必要性,从而否认其责任能力。这一基础理论的新发展,对于当下刑事合规的体系地位与理论根据找寻提供了启示。刑事合规能够产生企业刑事责任减免的司法效果,而其理论依据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有论者通过因果关系、注意义务等判断将刑事合规作为阻却不法的事由,也有论者通过期待可能性理论将其作为阻却责任的事由,那么受刑能力否定说不失为一种值得探索的理论路径。若企业在前期依据规范制作符合规定的刑事合规方案并执行,那么:一是体现其最终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可能具备某种程度的不可避免性,因而否定其非难可能性;二是其对法规范遵从、尊重的态度已经通过对合规方案的执行得以呈现,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已经通过积

极的行为表明对其施加刑罚,并不能再起到额外改造、教育或者预防的效果,依据受刑能力说,就没有必要肯定其受刑能力即责任能力。这种理解与刑事合规制度彰显的积极的预防刑旨趣相统一。

9. 共犯的法理:意思主体共同说

新派对于共犯的法理持行为共同说,认为共犯的共同在于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共同的行为,即可以成立共犯而不要求犯罪的同一或特定^{[27]519}。新派关注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表现出反社会的内心意思,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突破共犯成立的法理,采取比行为共同说更进一步的意思主体共同说。意思主体共同说认为共犯的共同在于共同的意思,共同正犯是数人“同心一体”,即具有共同目的结为一体而实施犯罪的情形,共犯中至少有一人实施犯罪的行为,其效果及于共同意思之整体^[49]。在一定的共同犯罪目的统制下,行为人之间“由异心别体变为同心一体”^{[13]267},共同意思主体,此时其中一人着手实行犯罪,将共同意思现实化,就成立共犯。

不论是犯罪共同说还是行为共同说,都更倾向于从客观方面入手考虑共犯的成立,于是在对于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寻找依据方面表现出局限性,意思主体共同说则可以为共谋共同正犯提供合理依据。意思主体共同说受到批评主要在于过于强调主观方面,这是不全面的。意思主体共同说并没有否定客观表现形式,强调“同心一体”,客观上应当有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即共同意思指导之下的实行行为,对于通过共同意思筛选出来的关系进行限制,在此基础上再重点考察共犯之间的意思联络,更能从本质上合理把握共同犯罪区别于个体犯罪的特征。

10. 共犯论:共犯正犯化

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犯罪高发,与传统犯罪中正犯对于犯罪的实施与完成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不同,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互联网服务等帮助行为,对助推整个犯罪行为的完成起到与正犯旗鼓相当甚至超过正犯行为的决定性作用,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危害性。鉴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逐渐具备的类型化特征和独立的法益侵害性,帮助行为的单独入罪作为正犯处理呈现出必要性^[50]。共犯行为正犯化的做法在各国立法中都有体现,这是新派积极的一般预防观念在如今犯罪论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彰显。

四、结语

新派刑法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源流,理论色彩至今仍贯穿整个刑法学理论体系,对当今风险社会刑法规制的构建能够提供有效的灵感和方向指引。由此,认为新派在犯罪论领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说法,本文不予认可。本文认为当代刑法理论与刑事实践对于新、旧派理论的取舍:其一,宁可要庸俗肤浅,不要片面的深刻,虽然当代刑法理论常讲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但是针对当今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需要果敢地提倡合适的理论,以精准回应社会对刑法提出的新需求;其二,对于主观主义刑法观,一味站在传统客观主义立场上习惯性地否定不可取,应采取全面客观而非片面、含有偏见的目光,审视其当代理论价值,采取有利于社会发展、法益保护的部分予以应用,过分片面势必对社会造成损伤;其三,新派与旧派理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理论是刑法价值追求的一体两面,它们相互斗争又相互依赖,形成一对矛盾,共同交融,编织现代的刑事法网,抹杀一方,另外一方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张明楷. 刑法学:上[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98.
- [3] 萧前,李秀林,汪永祥.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M]. 3版. 汪永祥,杨耕,郭湛,修订.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4] 马克昌,莫洪宪.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
- [5] 小野清一郎.法律思想史概说[M].刘正杰,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 [6]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 [7] 许海山.欧洲历史[M].北京:线装书局,2006:343.
- [8] 罗伯茨 J M.欧洲史:下册[M].李腾,史悦,刘旭,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
- [9] 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 [10]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 [11] 施特拉腾韦特 G,库伦 L.刑法总论 I:犯罪论[M].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 [12] 帕多瓦尼 T.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M].陈忠林,译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7-309.
- [13] 童德华.外国刑法导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 [14] 罗克辛 K.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M]//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5.
- [15] 贝克 W.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9-39.
- [16] 童德华.刑法现代化理论的续造[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2,38(1):115.
- [17] 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与积极一般预防[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1):39.
- [18] 金德霍伊泽尔 W.刑法总论教科书[M].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1.
- [19] 陈冉.论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刑法保护[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3):80.
- [20] 罗宾逊 B.正义的直觉[M].谢杰,金翼翔,祖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10.
- [21] 郝艳兵.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价值观念及其立法实践[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7):15-23.
- [22] 苏彩霞.“风险社会”下抽象危险犯的扩张与限缩[J].法商研究,2011,28(4):30.
- [23] 郭玮.象征性刑法概念辨析[J].政治与法律,2018(10):91.
- [24] 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J].政治与法律,2017(3):35.
- [25] 贾健.象征性刑法“污名化”现象检讨:兼论象征性刑法的相对合理性[J].法商研究,2019,36(1):75-77.
- [26] 张志钢.论累积犯的法理:以污染环境罪为中心[J].环球法律评论,2017,39(2):175.
- [27] 陈家林.外国刑法理论的思潮与流变[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7.
- [28] 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6.
- [29] 耶赛克 H H.德国刑法教科书:上[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 [30] 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M].秦一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
- [31] 娄云生.法人犯罪[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 [32] 陈广君.论法人犯罪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1986(6):5.
- [33] 何秉松.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80.
- [34] 孙国祥.论法人犯罪[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46(2):133-134.
- [35] 陈学权,陶朗道.企业犯罪司法轻缓化背景下我国刑事司法之应对[J].政法论丛,2021(2):120.
- [36] 徐启明.法人刑事责任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126.
- [37] 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M].王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 [38] 韦塞尔斯 J.德国刑法总论[M].李昌珂,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4.

- [39] 张文. 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5(5): 16.
- [40] 刘艳红, 梁云宝. 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 或联说之提倡[J]. 法学评论, 2010(6): 32-33.
- [41] 张文, 刘艳红. 人格刑法学理论之推进与重建[J]. 浙江社会科学, 2004(1): 112.
- [42] 郑延谱. 从罪刑均衡到罪责刑相适应: 兼论刑法中“人”的消隐与凸显[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4, 32(6): 61.
- [43] 劳东燕. 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 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55(2): 17-23.
- [44] 杨建广, 杜宇. 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根基[J]. 学术研究, 2000(12): 84.
- [45] 木村龟二. 刑法学词典[M]. 顾肖荣, 等译. 上海: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 [46] 张小虎. 当代刑事责任论的基本元素及其整合形态分析[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3, 21(1): 135-143.
- [47] 冯军. 刑事责任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6: 235.
- [48] 张文显. 法理学[M]. 5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64.
- [49] 林亚刚. 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J]. 法学评论, 2001(4): 36.
- [50] 于冲.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规范解读与理论省思[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7(1): 88-89.

Refutation of the View That “New-School Theory Has Retired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 Status of the Criminal New-School Theory

TONG Dehua, ZHANG Yiran

(Criminal Justice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New-school theory emerged in Europ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ts theoretical lineage is rooted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riminal law, which still has unique value in criminal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today. The view that “the new-school theory has retired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crime theory” is questionable, as the new-school theory has not retired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 ei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e theory or penalty theory.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law theory, the old-school theory and the new-school theory were born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re were two typical clashe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school theory, and after the second conflicts subsided, the synthesisist view of criminal law was formed. The new-school theory is still active in the contemporary arena and has a series of important appearances, including the appearance responding to society in today's risk-based, democratized, information-based, and post-modern societies, the appearance of legislation with the early involvement of criminal law, the increase of abstract dangerous offenders and symbolic legislation,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ory of crime in the ten major theoretical areas of conduct, negligence, the subject of crime, the result of crime, causation, substantive illegality, the nature of responsibility, the capacity for responsi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complicity.

Key words: new-school theory; old-school theory; subjectivism; objectivism; criminology

(责任编辑: 李晓梅)

· 人文交通 ·

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思考

彭 勇, 张成茜, 刘 松

(重庆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 重庆 400074)

摘 要: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建设是加快实现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都市圈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系统梳理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分析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提出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的策略。发展策略明确“普惠均等、便捷舒适、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的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建设目标,从协同机制、发展规划、经营主体、财政补贴、票价机制等多个维度提出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路径。

关键词:重庆都市圈; 公交一体化;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23)04-0023-07

一、引言

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1],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高质量增长转换的重要举措。2020年10月16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重庆都市圈发展新格局,提出应该着力提升重庆主城的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发展向内涵提升转变,以点带面、均衡发展,同周边市县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2]。都市圈建设任务重大,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必须坚持交通先行的理念。2022年8月,《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重庆都市圈的范围及发展目标,提出逐步常态化开行跨区域城际客运公交^[3],为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改造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推动,重庆市居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2021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 803元,比上年增长9.7%^[4]。居民出行目的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出行路线由区内通勤向跨区往返延伸。除了以上下班、上下学通勤为主的距离短且范围窄为特点的区域出行需求外,以娱乐、餐饮、购物等休闲为目的的远距离和跨区出行需求也随之增长。人民群众出行目的日益多元化,总体上呈现通勤出行比例下降、生活类弹性出行比例升高的特征^[5]。

目前重庆都市圈整体实力、空间布局、同城化水平等与国内外成熟都市圈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短板需要加快补齐^[3]。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都市圈建设的重要一环,促进交通发展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更多动力。目前重庆市公交的分区化运营使得区域之间联系较弱,严重制约重庆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加快实现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有利于增强成渝经济双圈联动性,推动重庆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区的引领作用,

* 收稿日期:2022-10-29; 修订日期:2023-02-01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通道战略下内陆国际物流枢纽转运效率评估及提升策略研究”(2019YBGL049);重庆市交通局科技项目“重庆市定制客运监管体系与发展路径研究”(2022-17)

作者简介:彭勇,男,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博士。

同时也能够改善社会民生^[6],更好地满足群众“门到门”“点到点”的出行需求。

二、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概况

近年来,国家和市级层面陆续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区域互联互通、优化道路客运服务,为公交一体化建设指引方向。2021年6月,交通运输部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提到要打造高效互联城际交通网,优化城乡融合交通网络,提高都市圈出行服务品质,推动城乡客运服务均等化等内容^[7]。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十四五”发展规划》,针对道路运输服务品质问题,为推进客运服务优化升级,要求强化道路客运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衔接,积极推进城市公交延伸、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

随着重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区域逐渐扩张,2022年8月22日《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据《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可知,重庆都市圈由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以下简称中心城区)和紧密联系的周边城市构成,包括重庆21个区及四川省广安市。重庆都市圈建设要求统筹交通等布局,实施区县域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推进具备条件的毗邻地区开行公交线路和中心城区近郊班线公交化、农村客运与城市公交有效接驳,形成中心城区带动周边区(市、县)一体化发展格局^[3]。本文研究的都市圈公交一体化是在都市圈建设规划基础上满足城乡均等化发展要求,实现都市圈公交互联互通,实现都市圈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管理,为市民提供优质出行服务。该模式下需统一公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明确公交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明确公交运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共享机制,明确公交发展和公交先行的政策保障机制等内容。

在重庆主城都市区向外扩展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改革,重庆都市圈公交客运结构逐渐明晰。2006年,由于现有运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公交服务的需要,重庆进行了内环以内的公交化改造、公司化改造^[8]。2010年,开展“绕城内”客运结构调整,对公交客运企业运营的班车实施公交化改造,对运营的班车通过置换出租汽车的方式退出班车经营^[9]。2014年,对主城都市区“二环外”区域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对具备公交开行条件的区域逐步开行公交线路,不具备条件的区域开行班车客运线路。

重庆中心城区公交经营主体为重庆公交集团,主要负责中心城区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及部分内外连接线的公交服务^[10]。中心城区已经基本能够实现五百米内公交站点全覆盖,换乘接驳系统也较完善。都市新区经营主体主要由重庆交运集团与多家民营企业构成,负责各区县内部、区县间以及与中心城区对开的运输任务。重庆交运集团已对市区至綦江区、市区至永川区等线路实施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并开行江津区、璧山区同城公交,实现都市新区至中心城区城际公交零的突破。

三、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问题

在政策支持下,实现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势在必行。但目前规划、经营主体、标准规范、公交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缺乏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规划。重庆市公交与道路客运分别由各级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城市公共汽车处与客运处管理,目前未形成市级层面的公交一体化发展专项规划。由于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公交服务网络与信息化建设缺乏指导,导致线网规划设置和运营调度割裂,形成信息孤岛,难以实现总体最优。

二是经营主体矛盾难调和。中心城区公交经营主体为公交集团,都市新区经营主体为交运集团与多家民营企业。多家经营主体会导致经营标准难统一、责任划分难落实,跨区域的公交线路会引发经营主体之间的相互抵触。以渝南线为例,该线路有多个经营主体,部分主体属于当地运输企业,其车辆为承包经营,若对该线路实行公交化改造,企业归属问题将会引起多方不满。除此之外,都市新区要实现与中心城区的公交一体化,主要依靠对现有客运班线、农村客运进行公交化改造,而这些经营主体目前不可能参照“二环内”用出租汽车置换方式解决存量的改革方案,公益性与逐利性矛盾难以协调。

三是公交运行的道路缺乏标准规范。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九部委《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由城市延伸进入农村的公交线路原则不设立站立位,特别是途经高速公路、山区公路、四级以下农村公路的线路,禁止使用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客车^[11],直辖市需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增加了毗邻农村公交开行难度。2020年6月,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定并下发《重庆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为保证运营安全加大监管力度,规定禁止设立乘客站立区的公交客车进入高速公路。随着中心城区外扩,部分高速公路进入中心城区范围,但缺乏相应的道路运行标准规范,不利于途经高速公路、中途没有上下客点的地区开展公交一体化改造。例如,南川区、长寿区与中心城区必须通过高速公路连接,江津区也有多条客运线路途经高速公路。需要明确此类线路可使用的车型,以及车速限制等标准。

四是都市圈公交服务补贴不统一,IC卡未能实现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都市圈的发展目标之一,在公交方面未形成都市圈内联动的补贴机制,市财政暂不承担同城公交补贴,补贴由各同城公交开行区县承担。中心城区和都市新区存在享受免费、优惠乘坐公交的对象及补贴标准范围不一致的问题,表1列举了中心城区、江津等地区的优惠政策。此外,中心城区、都市新区的公共客运IC卡所属运营商不同,运营规范也不同,未能实现互联互通。

五是基础设施设备建设不完善。尚未形成基础设施、站点停靠、信息发布共享的一体化模式。客运枢纽、首末站、中途站、换乘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中心城区与都市新区智慧公交、绿色公交建设程度参差不齐。比如,重庆东城公交已经引入智能调度运营、扫码支付、GPS卫星定位、驾驶员主动防御系统、易燃易爆易挥发物品检测报警等系统设备,新能源车辆占比达到80%,建设充电桩350个,充电桩与新能源车辆比约为1:1.5;而江津等地区的智能化设备应用不足,缺乏大型充电站、充电桩,新能源公交车投入量相对较少;南川区公交移动支付还处于起步阶段,2021年公交移动支付次数占比仅为2.28%。都市圈内道路客运站和城市公交站场资源未有效整合,公交集团的首末站场均设置在“二环内”,客运站场体系难以满足客运一体化发展需求。

表1 公交优惠政策

地区	优惠政策
中心城区	票价:总长25公里以内执行“一票制”(线路占比95%),即普通车实行上车1元,中高级车实行上车2元;总长在25公里以上执行多级票制(线路占比5%),每张客票按1.5元起价,0.5元进制 公交卡:分为普通卡、成人优惠卡、学生卡、三四级残疾人爱心优惠卡、免费卡五类,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纳入中心城区公交、轨道“一小时免费换乘”,移动扫码支付不享受该换乘优惠
江津	票价:实行2元一票制和多票制模式 公交卡:区籍65周岁以上老年人、一二级残疾人免费乘坐区内公交车,三四级残疾人、学生享半价乘坐区内公交车,普通卡享75折乘坐区内公交车,实行“半小时免费换乘”政策
璧山	公交卡:区交运通IC卡可更换为全国互联互通公交卡,但目前老人卡、爱心卡、优惠卡、学生卡不能更换,只能在区内范围使用。65周岁以上老年人、一二级残疾人(含外来人员)办理IC卡后可免费乘坐区内公交车,三四级残疾人(含外来人员)、学生办理IC卡后享半价乘坐区内公交车,普通卡享9折乘坐区内公交车。对持敬老卡、爱心卡、人才卡、学生卡、残疾人优惠卡的乘客刷卡乘坐公共客运产生的营运差额进行补贴;区发行的普通卡、残疾人优惠卡享受“一小时免费优惠换乘”,免费优惠换乘费用普通卡区财政补贴75%,公交企业负担25%;残疾人优惠卡区财政补贴40%,公交企业负担60%据实补贴
长寿	票价:区内2元,专线通票3元 公交卡:区籍65周岁以上老年人、一二级残疾人免费乘坐区内公交车,三四级残疾人半价乘坐区内公交车,普通卡享9折乘坐区内公交车,暂未开通学生卡
南川	公交卡:区籍65周岁以上老年人、一二级残疾人持卡乘坐区内公交车每半年免费450次,三四级残疾人享受半价乘坐区内公交车优惠,暂未开通学生卡

四、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策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形成都市圈公交一体化运营格局。构建协同机制,统筹布局都市圈公交一体化。优化公交客运资源配置,增强经营主体可持续性,推进城际公交、城乡公交、镇村公交有机衔接与融合发展,实现区域互联互通。实现公交服务均等共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发展目标

建成“普惠均等、便捷舒适、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的都市圈城乡公交客运一体化服务体系,形成多层次公交客运服务线网,健全都市圈城乡公交客运发展长效机制,实现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

一是依托现有客运班线运营主体,通过资源整合完成都市圈客运班线公司化、公交化改造,开通城际公交。二是中心城区与都市新区,以及都市新区的毗邻区域实现公交通达率 100%,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城乡公交服务网络。三是完成都市新区各地区客运班线公司化、公交化改造,到乡(镇)公交通达基本实现全覆盖;行政村和集中居住点到城区的公交直达率达到 90% 以上,建成全域公交。三是城乡公交融合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铁路客运站、汽车客运站、轨道交通站、新建机场公交接驳和旅游景区公交通达实现全覆盖;全面开展“运”“游”融合,开通镇村公交示范线路和乡村旅游公交示范线路。四是形成“群众享实惠、企业可持续、财政能负担”的多层次、差别化的都市圈公交一体化运价机制。进一步规范都市圈城乡公交运营服务,使得候车时间更短、乘车环境更舒适、信息查询更便捷、支付方式更丰富,有效降低城乡群众出行成本,百姓出行获得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二)发展路径

1. 构建协同机制

加强都市圈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成立由重庆市政府领导负责、市级相关部门以及都市新区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建立交通专项合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共同研究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机制、线路开通方案等事项,协商解决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保证政策出台、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执法监督等方面的一致性。

2. 实施规划引领

国内已有部分地区发布了公交一体化改造方案,并开展公交一体化改造行动。河南省平顶山市出台全域公交一体化实施方案,提出构建全域公交体系,编制全域公交线网规划,建立全域公交运价标准等内容^[12]。江苏省发布公交一体化发展计划,并开展相关行动。济南市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编制全市公交一体化规划,统筹规划城乡客运设施和运营线路布局,构建城市公交、区际公交、城乡公交融合发展的城乡客运网络等内容^[13]。

可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验,依据《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重庆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1—2035 年)》《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等相关规划,编制《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规划》,对都市圈公交发展作出总体布局,明晰中心城区公交、城区间干线公交、区县全域公交的内涵与发展定位,服务区域,服务边界等内容,结合道路客运流向、流时、流量及公路通达程度,编制都市圈公交线网规划,实现城乡“公交一张网”。

3. 优化公交客运资源配置

北京市以“城优郊进”思路,向远郊区县、城市副中心、新建大型社区等新兴区域进行公交优质服务延伸覆盖,并进一步辐射京津冀地区公交客运市场。山东省荣成市启动对城乡客运班线车辆的收购工作,实现城乡线路运营权转移,为全市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工作铺平道路^[14]。

重庆都市圈可按照“政府主导、公司运营、城乡一体”的思路,优化公交客运资源配置。参照《重庆市主城区公共交通覆盖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工作方案》《重庆市主城区绕城高速公路以外区域客运

结构调整工作方案》《重庆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等文件,由政府主导联合多部门制定统一的运营服务标准。为满足政府及行业部门对企业安全、服务、运营等方面管理的各项要求,按照“就高”原则设置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市场准入条件:公交客运企业应当拥有 500 辆以上自有产权的 10 座以上公交车辆,5000 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依托原有大型客运班线经营主体实施都市圈客运班线公司化、公交化改造,实行集约化经营、标准化服务、规范化管理。推进具备条件的毗邻地区开行公交线路,由交通运管、公安交警、城市规划、城建、市政、城市公交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现场勘察,结合居民出行需求、道路实际通行情况、安全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协商确定公交线路开行方案。推进都市圈城际公交、城乡公交、镇村公交等业态资源整合,提高都市圈一体化协同和线网无缝衔接能力,努力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衔接顺畅的公交一体化运行机制,实现先进管理及优质服务输出,支撑都市圈发展。

4. 优化道路运行标准规范

应由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联合公安交管、城市道路和公路管理等部门,组织专家充分调研各个城市管理规定及运行情况。结合重庆公交运行实际环境,在保证运营安全的前提下,制定城际公交和城乡公交不同道路运行环境下的车速、车型、核载等技术标准,优化道路运行规范,促进各地区改善农村道路条件,为实现都市圈公交一体化提供扎实基础。

5. 完善财政补贴机制

财政补贴方面,可参考浙江省、上海市等地采取的措施。浙江省实行公交化改造后,票价在原客运班线的基础上下调 15%~20%,差额部分通过财政补贴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上海市对采用公交模式运营的省际毗邻客运线路,属地政府将线路纳入城市公共交通补贴范围,享受公共交通企业税收、贷款等减免优惠政策。济宁市公交运营补贴资金由市与县(市、区)按一定比例分担。

充分考虑中心城区与都市新区两级财政能力,近期实现属地化目标,远期实现均等化目标。财政等相关部门可采取“市财政补贴为主、区财政补贴为辅”方式,协同制定合理的补贴分担机制。逐步减少城乡居民出行成本的结构性差异,让都市新区也能够享受中心城区的同等待遇。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无差异化政策,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鼓励公交企业强化管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支出。同时建立规范的成本费用评价制度和政策性亏损评估制度,对企业的成本和费用进行年度审计与评价,合理界定和计算政策性亏损,并给予相应补贴。

未来,在财政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改革、财政补贴资金纳入市级公共财政体系,重点在专项规划实施、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公交车辆购置更新、新能源充配电设施建设、公交车辆运营、IC 卡互联互通改造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公交运营企业对各类人员免费乘车、优惠乘车和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增加的支出,由当地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付相关费用。

6.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一枢纽多场站”的格局,完善都市圈综合客运枢纽、首末站、中途站、换乘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都市圈内有条件的道路设置公交专用道,保障公交路权。在公交首末站、汽车客运站、综合客运枢纽等场地大力推进新能源充配电设备设施建设。推广应用智能站台、站牌,实现设施智能化、统一化。集约利用城市道路资源,向都市新区公交经营主体开放公交基础设施,同时应遵守中心城区经营主体的使用条件。

按照国家政策,选择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交通卡互联互通工程,加大力度普及公交移动便捷支付。首先,应会同都市圈各地区相关部门制定一卡通标准规范体系,包括制定技术标准、清分结算业务规则。其次,协商建立都市圈清分结算平台,解决多地结算、多个卡机问题。最后,推动都市新区公交支付系统升级改造,逐步实现“一卡通”便捷支付。

7. 完善公交票价机制

目前京津冀地区实行阶梯票价制度,刷卡乘坐的优惠政策为市域内普通卡 5 折、学生卡 2.5 折,市

域外普通卡、学生卡均为8折。粤港澳地区实行的票价制度按照不同改造方式分为一票制、阶梯票价,一票制适用于原城市公交线路延伸方式,执行原城市公交票价;阶梯票价适用于较长城际公交线路,根据里程等因素分段计价;介于城市公交和道路客运之间的类型即班线公交化改造线路,执行比原有道路客运价格稍低、比公交价格略高的定价模式。

公共汽车具有鲜明的公益属性,是满足城市居民基本出行的重要保障^[15]。公交一体化改革后的票价应低于改革前客运班线票价,让更多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可参考京津冀、粤港澳地区实行的票价制度,中心城区公交执行一票制,都市圈内城际公交和城乡公交执行阶梯票价。同时,应秉持公益性、企业运营性、合理高效、可持续发展等原则^[16],根据客流量、运营成本、服务质量、运输距离等因素,建立都市圈公交一体化改造成本测算体系,既突出社会效益又兼顾经济效益,科学合理制定“群众享实惠、财政可承担、企业能持续”的公交票价机制。

8. 打造都市圈公交出行一体化平台

建立公交智能调度系统,推动中心城区与都市新区公交数据资源交换共享,打造都市圈公交 Maas(出行即服务)一体化平台。深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车联网等新技术,实现公交运营管理智能化,达到精准调度、精确服务、精细管理,实现公交线路、站台、换乘信息“一网覆盖、一键服务”。优化出行服务,积极探索发展需求响应式定制公交出行服务,更好地满足多元化出行需求。

五、结语

为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实现重庆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目标,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十分必要。未来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借鉴多地公交一体化改造的成功经验,由都市圈各地区政府共同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重庆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公交一体化进程,为重庆都市圈建设夯实基础。优化道路运行规范,加快完善各地区道路条件,满足公交一体化改造的要求。紧跟轨道、都市快轨线网向都市区外延覆盖步伐,同步向外布局公交线路。充分考虑中心城区与都市新区两级财政能力,建立合理的补贴分担机制,让市民享受同网、同质、同价的公交出行服务。由多部门联合设定公交运营标准,推进公交企业规模化、集约化运营,合理制定、动态调整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完善综合客运枢纽、首末站等基础设施,制定一卡通标准规范体系,建立都市圈一卡通结算中心,逐步推进公交 IC 卡互联互通工程。根据公共汽车的公益属性,完善票价机制,保障广大市民公交出行的可负担能力。打造都市圈公交出行一体化平台,助力都市圈公交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郑洲,唐正倩.成渝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述评及研究展望[J].新西部,2020,21(16):33-37.
- [2]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EB/OL].(2021-10-21)[2022-10-06].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3875.htm.
- [3] 重庆市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的通知[J].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022(16):1-23.
- [4] 重庆市统计局.2021年重庆高质量发展报告·共享发展篇[EB/OL].(2022-06-16)[2022-10-09].http://tjj.cq.gov.cn/zwgk_233/fdzdgknr/tjxx/sjld_55469/202206/t20220616_10821977.html.
- [5] 汪光焘,王继峰,赵珺玲.新时期城市交通需求演变与展望[J].城市交通,2020,18(4):1-10.
- [6] 卓健,尉闻,李云娜.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的实施困境与应对策略[J].规划师,2019,35(15):19-25.
- [7] 谢英仪.加快构建成渝地区高质量综合交通运输体系[J].中国经贸导刊,2021(14):25-26.
- [8]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主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客运运营与管理体制的决定[J].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021(16):1-10.

- 公报,2006(20):19-21.
- [9]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主城区公共交通覆盖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工作方案的通知[J].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010(9):20-21.
- [10] 余欢. 重庆同城公交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J]. 交通世界,2022(19):7-9.
- [11] 夏小禾. 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N]. 机电商报,2021-08-23(A2).
- [12]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全域公交一体化实施方案的通知[J].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公报,2021(1):24-29.
- [13]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J].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2021(7):25-28.
- [14] 孙庆军,李峰,周欣. 城乡公交一体化的现实困境及发展建议[J]. 城市公共交通,2020(12):34-39.
- [15] 苏跃江,周芦芦,胡郁葱,等. 公共汽车票价体系和补贴机制问题与思考[J]. 城市交通,2022,20(6):46-55.
- [16] 王道有. 基于客流量、成本、票价及服务质量的公交补贴联动机制[D]. 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21.

Thinking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us in Chongqing Metropolitan Area

PENG Yong, ZHANG Chengxi, LIU Song

(College of Traffic & Transportation,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bus integration in Chongqing metropolitan are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peed up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interconnection, dri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area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metropolitan area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ongqing metropolitan area, deep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bus integration in Chongqing metropolitan area,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bu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ongqing metropolitan area.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makes clear the construction target of being “inclusive and equal,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safe and reliable,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bus integration in Chongqing metropolitan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operating subject, financial subsidy, fare mechanism and so on.

Key words: Chongqing metropolitan area; bu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责任编辑:张 璠)